

对于人猿划分问题的一点意见

袁 汉 兴
(武汉低压锅炉厂)

对于人和猿的划分,恩格斯在著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里,已作了圆满的科学回答。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正确理解,目前我国人类学家和关心人类起源研究的同志,对人猿划分问题进行的讨论,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人类学研究工作的进展也是有好处的。

周作云在《人猿分野辨》一文中,单纯地以“使用原则”将人和猿绝对划分开。我认为这种划分法不符合人类起源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恩格斯对人猿之间存在过渡阶段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科学论断。(见《自然辩证法》)

吴汝康在《人和猿的界限问题》中,提出“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人的新质和猿的或动物的旧质不断斗争的过程,是新质不断克服旧质的过程。从物质的主要运动形式来说,过渡时期还是属于生物运动形式的范畴,还是受制于较低级的生物学规律或动物学规律”。我认为这种提法混淆了生物进化和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渡时期中所起的作用的本质区别;他用拉马克的生物进化法则简单地说明人类起源及发展,是不符合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的。

这里,我简单地谈谈我对人猿的划分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据古气候学报道:在第三纪地球上曾发生了几次“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李贺《古悠悠行》)的变化。这时有的地区气候变得干燥,地壳出现了强烈的升降运动。更新世开始又有的区域发生了冰川期或间冰川期的交替,造成大片森林逐渐减少或消失,间隔的草原地带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的结果,是促使古猿离开森林转移到地面运用两足行走以适应地面生活需要的外界因素,而决定的因素是古猿体质的内在变化。森林古猿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分化。它们中间有的随着森林的变化迁移,继续向猿类的进化方向发展;有的不能随着森林变化而迁移,又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被自然界淘汰;而有一支在长期树栖生活过程中,时常用前肢采摘果实和捕捉小动物;后肢抓握树枝以支持身体的直立或全身的运动,引起了骨骼和韧带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手足的分化及直立行走准备了条件,改变长期的树栖生活习性逐渐转移到地面;为了适应复杂的新环境,他们必须通过**本能的劳动**(使用**天然的石块、木棒等**)与变化不平衡的自然界进行艰苦而又漫长的斗争,渐渐地向人的方向发展。恩格斯对于适应环境变化的古猿曾作过分析,他说:“**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

正如环境的变化一样,适应变化的古猿转入地面从事采集食物,防御敌害和猎取兽类,保护自己时,可能像现代类人猿和最初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以半直立的姿势行走,有时还需用前肢或手帮忙,从手离开地面到完全用脚直立行走或支持全身重量时,需要“**经**

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由于劳动的结果,古猿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处在地面生活最原始的蒙昧时代的“形成中的人”,使用木棒、石块等天然工具是过渡时期的劳动形式,属于劳动的范畴。这种劳动形式一般地还不能达到制造工具的高级阶段。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是本能的劳动。本能的劳动促使了猿手逐渐地灵巧,向人手的方向发展;同时脚也适应于直立行走,正因手脚的分工和专门化才促进了古猿的其它机体的变化。这一切变化是使用天然工具即本能劳动的结果。

周作云认为使用天然的石块和木棒,直立行走,手足专门化的“形成中的人”是第一批原始人,他把人和猿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线,否认他们之间存在过渡期,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符合恩格斯的“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的科学论断。

周作云还认为:“蒙昧早期的人是‘完全形成的人’了;使用最早的人造的工具从事打猎的蒙昧中期的人类是‘形成中的人’”。他的这种提法显然是颠倒人类起源及发展史,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唯物主义观点。周作云文章的问题是没有弄清本能的劳动与有意识的劳动的本质区别。

唯物主义者认为: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向前发展的杠杆是:“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从事高级的本能劳动。吴汝康却错误地把使用天然工具的“形成中的人”的重心放在动物界的位置上,他纯粹地用生物运动说明“形成中的人”,本能的使用天然的劳动工具在人类史上的巨大作用。其实,“形成中的人”同动物和“完全形成的人”的劳动形式有本质的区别,而且还有本身的特点。那就是,“形成中的人”在劳动中改变了与自然界的联系,由单纯地依靠本身的器官适应自然的变化,发展到狭义的利用天然的石块、木棒等劳动工具,从事人类最初的低级生产活动。“形成中的人”使用天然工具与自然界进行本能的斗争,这使动植物在“形成中的人”劳动影响下改变位置。而动物(包括猿类)没有这种使用劳动工具迫使动植物改变位置的能力,它们主要是用本身的器官滥用自然资源,简单地适应自然的变化向前进化。“完全形成的人”则使用制造的工具改造和控制自然,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类的目的。

一百六十五年前,拉马克没有掌握可靠的事实,来评价“形成中的人”在人类史上的地位。他在他的名著《动物哲学》和《人类意识活动的分析》中机械地用他关于动物进化的法则予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由于环境影响或其它原因,而使古猿失去攀树和用后肢抓握树枝的习性,当古猿下地时,后肢就被迫行走,停止前肢行走的习性。这样,它的后肢才逐渐地形成支持身体的直立姿势所必需的构造。由于地面生活迫使古猿向远方展望,努力采取直立姿势,并把这样的习性世代地保持着。

吴汝康受拉马克的影响,提出古猿“在树上进食和行动,能够用手把身体悬挂在树枝上,摆动身体,从一树枝移动到另一树枝,用手臂来移动身体,叫做‘臂行’,因而它们的躯干经常保持在垂直的位置。它们有时也到森林边缘和空旷的林地上活动。在中新世(距今2500—1200万年前),地球上的温度普遍降低,气候变冷,伴随着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常绿的森林减少了,在许多地方被落叶林所替代。空旷的林地向增大和增多了。原先在森林中和在林边活动和觅取食物的古猿,……从林中取食改变到地面取食,食物的种类也改

变了,从主要是果类改变到较为坚硬的小的植物种子和块根等,也包括较多的肉食。为了适应这种全新的食物类型和生活方式,齿列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经常地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来防御敌害和获取食物。在树林中臂行的习性为它们的直立姿势奠定了基础。站起来能看到大片林间的草地,在各个方向注视猎物和敌害。如有危险,附近就有树,可上树躲避,并加强群体的协作,共同来保卫。它们的身体细小和灵巧,大约和现代的黑猩猩矮小种的大小相似,容易站立起来,并善于奔跑,双脚逐步丧失其抓握的功能。它们逐渐能两足直立行走,整个身体的结构和机能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前肢一旦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经常使用天然工具,手变得更为灵巧,也促进了脑的变化和发展,自觉的能动性在萌发之中。白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夜间仍在树林中藏身或在悬崖的岩石间过夜”。

吴汝康虽然在这里也提示了使用木棒和石块等天然工具,在从猿转变成人的过渡时期中的作用。然而他仍旧主要地用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代替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学说,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恩格斯对这种错误地分析人类起源的作法,曾指出过:“**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够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的即所谓预言式的答案**”。(《反杜林论》)恩格斯还强调指出:“**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自然辩证法》)

我认为:古猿的体质变化是古猿向人的方向发展的内因,环境变化是外因。而劳动则是促进古猿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杠杆,如果没有劳动这个杠杆的作用,古猿向人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环境变化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对于人猿的划分,我们用什么标尺来衡量呢? **劳动**。依据现阶段发掘出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及和他们在一起的石器工具的研究结果证实:只有劳动,才使人类的祖先——古猿从只能进行无意识的本能活动、主要依靠自身的器官取得现存的食物,同大自然进行顽强搏斗,消极地适应自然界变化的生物运动形式中解放出来;只有劳动,才能够使古猿的体质逐渐地发生变化,以便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只有劳动,才能够使古猿摆脱低级的动物的本能活动,向高级的本能劳动形式即本能的使用天然工具的方向发展,积极地同自然界进行斗争;只有劳动,使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行有意识的活动即有意识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只有劳动,才使语言、意识、思维、社会等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只有劳动,才能解决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的体质在劳动、环境变化、语言、意识、思维、社会等相互作用的推动下,不断地向前发展。

对于“形成中的人”用什么准则来衡量呢? **劳动**。我认为:本能的使用天然工具是从猿变成人的过程中的劳动形式。是“形成中的人”最高的劳动形式。因为“形成中的人”的劳动形式已超出了狭义的生物运动范畴,不再受较低级的生物学规律或动物学规律的支配。“形成中的人”在本能的劳动作用的推动下,逐渐地摆脱了低级的生物或动物简单地利用本身器官为生存斗争服务的落后状态。

对于“完全形成的人”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呢? **劳动**。按恩格斯所说的“**劳动是从制造**

工具开始的”。我认为能劳动,使用天然工具是“形成中的人”,能使用和制造工具者是真正的人,是“完全形成的人”。只有制造工具才是真正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只有人才有这种能力和行动,只有将采集的长期用来投、砸、压、切的石块,按照他们自己的目的经过集体劳动的智慧和才能,打制出具有一定形状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粗笨石器工具的才是人。只有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使自然界为自己造福;只有制造并使用工具,才使人的体质发生质变。自觉能动地制造工具是人所独有的,是区别于动物和“形成中的人”的根本;动物(树栖生活的猿类)和“形成中的人”都没有人这样的能力。“形成中的人”只能意识到使用天然工具通过劳动保护自己的存在,没有到达制造的高级阶段。只有制造工具者,才有意识地在劳动中改造和控制自然界,改变动植物的位置,创造人类历史。

从人类起源以及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史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之流,同那些神学家、宗教信徒、孔家店的儒生、复古崇洋者等形形色色的唯心论者一样,口沫四溅地鼓吹“中庸之道”,“人是自然物”,“头脑制造法则”,“娘肚子里带来的”少数“天才”,“超天才”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他们散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上帝创造人”的翻版,其目的是妄图使历史倒退,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制造舆论准备,而他们的谣言诡辩在人类史面前,只落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耻下场。

参 考 文 献

- 周作云:人猿分野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2卷1期。
吴汝康:人和猿的界限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2卷3期。
吴汝康:人类起源的辩证唯物过程,科学通报,1974年8月。

(1974年8月28日收到)